

● 许 淇

学院与酒吧

——十九世纪，一群巴黎艺术家……

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：“我的本行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。”

在伏尔泰和卢骚传诵一时的巴黎；巴士底监狱被砸烂消失的巴黎；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吐出临终名言的巴黎；雨果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大声演说的巴黎；波特莱尔出版了诗集《恶之花》，竟被送上法庭的巴黎……艺术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、新印象主义……是否做到同当年伏尔泰说的：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呢？反正艺术家们就这样干了。存在就是合理。

学院派的古典主义，肯定要攻击自由创作的，离经叛道者遭安格尔大师的指责，仅仅技术方面就规定很多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可；学院派代表官方，权威评委们看不惯的画，一律逐出春季沙龙展览，于是落选的画家们自己搞秋季沙龙，同样是全国性的，皇帝没发脾气，官方无暇制止，这就形成“秋色斑斓”“胜似春光”的局面。除此而外，非“秋季”自由组合办的流派画展，一时也相当活跃。

法国巴黎成了世界艺术之都。艺术学徒们、成名的和未成名的，都纷纷聚集巴黎，他们大都并非出自宫廷庙堂，而是从民间来，从社会的底层来，过着波希米亚的生活；学习也不到正规的学校，拿不上高等学府巴黎美术学院的文凭。没有文凭照样画得好，不必画外功夫大事炒作，这种情况，从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初变本加厉。租一间画室，雇一个模特儿，喝一杯苦咖啡，来自西班牙的、意大利的、俄罗斯的、日本岛的……归不了类，美术史家命之为“巴黎派”。

早些时，有一位瑞士籍的老人，名叫格莱巴苏尔，名不见经传，是无数巴黎的流浪者之一；他一生钟爱艺术，愿意为艺术献身，可自己不会画，怎么办？这瑞士老头倔，不愿意欺世盗名，生编一大堆头衔贴到脑门上咋唬人，不会画就是不会画，放弃吧！

看那些小青年画得多有灵气！在他们中间肯定会产生未来的大师！给他们当模特儿吧！比自己浪费颜料制造垃圾艺术强。当过几年模特儿，又得了一笔馈赠，积蓄了些钱之后，他异想天开自个儿想办一所美术学院，在巴黎奥飞弗尔码头圣·米歇儿大桥不远的地方，租了一大间房，取名瑞赛美术学院。

瑞赛美术学院没有教授，没有教学大纲，不讲课，不发文凭或结业证什么的，每个月交10法郎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自由！艺术就是自由！没有导师束缚你的手脚，同学相互之间是平等的，营造一个大家交流技艺的好场所。

格莱巴苏尔不雇用助手，每天早晨，他亲自来打开教室的门，然后坐到他大教室隔开的小凹室里，一面吸烟，一面翻阅历年入校的花名册，待学生们陆续来了，模特儿也到了，便张罗着燃旺壁炉和大铁炉，木柴是备足了的。每学期头三个星期聘请男模特儿，第四个星期以后换女的，最后请美术学院著名的女模特儿客串。大概保持三十个人作画，当然也可以在角落里画别的。教室宽敞、简朴，墙上一律不挂画。老爹叼着不冒烟的烟斗，踱到每张画架后面巡视一遍，啧啧赞叹一阵之后，便回到他的“办公室”，去读他那永远读不完的“圣经”，昨天翻在哪一页，今天还是那一页，嘴唇神经质地嗽动着，读，却不发声。钟点到了，他使劲“啪”地合上那本精装书，代替了下课的铃声，模特儿快穿衣服，学生们收拾摊子，老爹摇晃着钥匙，该锁门了！

格莱巴苏尔每月初收10法郎学费的时候，对新来的学生说：“你来瑞赛学院对了，我相信你的天才和悟性。我们这个学院是产生大画家的地方……”说着，他擦一根瑞典火柴烧他的雕花烟斗，芳香随青烟袅袅飞散。“我们学院有浪漫主义、写实主义、印象主义……啥主义都有。你认识德拉克洛阿吗？还有库尔贝、马奈、莫奈、毕沙罗……他们现在还不肯

毕业。你有幸认识他们,向他们请教。”

这次交10法郎的学生叫保罗·塞尚,他是卡米尔·毕沙罗介绍来的。老爹点名的那几位,塞尚也都认识。不过他不合群。他总是躲在教室的左角落,画得和所有的人都不同,素描很糟糕,轮廓线不确定,往往用三根弧线联结。这个普罗旺斯来的乡巴佬,老爹认为他不够聪明,甚至有点笨头笨脑。

保罗·塞尚听说大画家欧仁·德拉克洛阿也偶来瑞赛学院,他一向崇敬这位创新的浪漫派,不喜欢安格尔大师的画,他还临摹过德拉克洛阿22岁时的成名作《但丁的渡舟》,不过完全是两码事,用自己的风格临摹,大块面、大笔触,要叫原作者见到,肯定会骂。他俩都是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。他俩在瑞赛见面,精神并不链接,被历史隔断了。大家还不可能预知,不起眼的带着普罗旺斯浓重乡音的塞尚,对后世的影响比德拉克洛阿还深远得多。

塞尚刚到角落支起画架,欧仁·德拉克洛阿进门了!很像德氏朋友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雕塑家或者简直是巴尔扎克本人,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!有巴黎皇家美术学校的金字招牌,传说他是一位亲王外交官的私生子。有了这些背景,画便值钱了,一开始创作,能在官方的沙龙展展出,并被国家购藏;手头的活儿自然是大宗的,一些公共建设的装饰画,甚至画卢佛宫的天花板也能揽到手里。他的来瑞赛美院,一为这段时间的模特儿正巧是创作所需,画几幅习作素材,这时他会嚷道:“我们今天就只画画,不聊天了好吗?”再则为逃避,不愿见的人想不到他会躲在这里消磨半日;三为叙旧,此时他便滔滔不绝,和一些观点不同、真正热爱艺术的艺术家人毫无功利之心地坦诚相见,是一种乐趣,语言自然出彩。塞尚铭记着他随口说的:“画家所画,永远是他自己,所谓题材主题,仅仅是表现他内心感觉的媒介而已。”但是德拉克洛阿从来没注意塞尚,却很看好在另一角落作画的版画家、漫画家杜米埃:“这位老弟,比我们任何人都画得好。瞧他的素描速写!如果依据传统素描的原理,能层次分明地表现立体感,就数他行!”

库尔贝亦有同感,不仅认为杜米埃的速写呱呱叫,连政治观点也和杜米埃一致。若德拉克洛阿不在场,库尔贝便是中心人物。库尔贝称赞德拉克洛阿的传世名作:《自由引导人民》,但他绝不会画象征的浪漫C人物,他的画忠实于客观。以致他的作品《浴女》,那中年裸女一身粗糙的赘肉,毫不掩饰地强调,遭学院派批评家视为“审丑”,逐出沙龙。

库尔贝和德拉克洛阿不同,不居高临下,和这

帮哥们兄弟平等相处,并乐于助人。他律师出身,雄辩的谈吐吸引了大家停下画笔,三言两语就把社会的病灶辛辣地端出来了,连模特儿都在那里洗耳恭听。但他怕老爹不高兴,适可而止,于是一丝不苟地用调色刀刮出背景的空间感和人体轮廓线的转折。“下课了,到老地方坐,那里的氛围太好了!”库尔贝像布置作业似的向他的朋友宣布。待到“啪”的一声,老爹的布面精装书终于合上。库尔贝领着大家一窝蜂地到他作为常客的库尔贝小酒馆去了。

晚饭往往就在那里解决。库尔贝的小酒馆肯定是平民化的,叫做安德勒酒吧——安德勒夫妇开的。从户外强光下骤一进屋,要待一阵才能分辨出座上客的轮廓。最亮处是安德勒夫人吧台上的一盏风雨灯,照着她身旁的巴伐利亚大啤酒桶,和柜上一排玻璃器皿像五线谱的跳动的音符般的高光。火腿、熏肉用铁勾挂在房椽上,几乎碰到老板娘的额头,像她戴着宫廷舞会的冠饰。画家们眯住眼睛,对这一角落的色彩对比很感兴趣,埋在暗影里的肉红色,个个想到伦勃朗描写的荷兰陋巷里的杰作。老顾客更称赞的是这家自制的奶酪,发酵虽略显过份些,更过份的是泡菜,将奶酪的霉味掩盖了,发散着酸馊的芥菜味,不仅是下酒妙品,且价格便宜。主菜要安德勒老板当场烧烤的小牛头肉或煎黑椒牛排,再加面包棒,就是平民奢侈的丰盛的晚餐了。如果德拉克洛阿在场,他会请每人喝一杯干邑白兰地或开胃红酒;库尔贝若刚卖掉一幅画,亦可让大家欢呼一番;塞尚家境富裕,后来居上,轮到他请的时候,只剩下印象派几位瑞赛学院的同学了。客人个个喷云吐雾,使小酒馆的空间反而无限扩展。诗人波特莱尔醉眼朦胧,仿佛自己行走在夜雾迷离的塞纳河畔,那劣质烟草混着男人的腥膻,他却觉得是销魂的“异域的芬芳”;在他的眼前,拓开了大海和幸福的海岸线。“乌木色的海,你容纳眩目的梦,那里有风帆、桨手、桅樯和彩旗……”(《恶之花》《头发》,郭宏安译)

波特莱尔是库尔贝的好朋友,和画家们都是好朋友。画家们占据了一张长条桌后,波特莱尔便端着他的苦艾酒坐过来,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,他始终喜欢坐在库尔贝的身边,因为他俩有共同的社会观点。蒲鲁东穿著简朴,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,库尔贝曾经像创作《石工》一样画蒲鲁东肖像,不经修饰的蓬发胡须,双目闪烁智慧,举止谈吐完全是贵族的精英化的。他对波特莱尔说:“你的诗集的书名,我考虑了一整天,我看就叫《罪恶的花朵》。那无比鲜艳的毒罂粟花,开自巴黎的底层的溃烂的伤口……”

波特莱尔被蒲鲁东唤醒了似的,兴奋地说:“我觉得生命的本质是邪恶,艺术使恶变成美。你取的书名和伊波利特·巴伯(Td ippolte Babou)不约而同,我决定了,就叫《恶之花》(Fleurs d'Amal)。谢谢!”

大家一致鼓起掌来。此时波特莱尔容光焕发,画家们觉得他真是上画。库尔贝画的《波特莱尔像》已经是名作,年轻的波特莱尔在出租屋里,穷困潦倒,家具只有一张床、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,墙壁上什么装饰品也没有;巴黎冬季的寒冷,使波特莱尔在屋里还穿着旧大衣,脖子围着厚围巾,他正在读一本书,并不是正襟危坐,而是斜靠着床,右手抓着被褥;既随便又专注,面前桌子扁圆的墨水瓶上插着洁白的鹅毛笔,仿佛即时因阅读启发灵感而倾泻诗句。天窗射下的光线,使聪慧的额头凸出,嘴里含着的烟斗,因下意识的出声在微微颤抖。库尔贝还把这幅肖像挪到他创作的巨画《画室》中去。

德拉克洛阿笔下的波特莱尔,和库尔贝的完全不同,古典浪漫的风格,和他所作其他几位,如乔治桑、肖邦,以及自画像的色调一致。22岁的波特莱尔到巴黎不久,长发连鬓鬃,风流倜傥,简直是个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。马奈画的波特莱尔的速写像,也是长发时期的,戴着高筒礼帽,虚虚几笔,犹如一个公子哥儿在巴黎街头行走。

幻想家波特莱尔在这群人中间显得太年轻了。和库尔贝一起从瑞赛学院到酒吧的杜米埃,比他年长十多岁,十多岁差一个辈份哩!杜米埃不喜欢波特莱尔的诗,他关注观实,就因为太关注现实了,他画政治漫画讽刺国王路易·菲力普,被抓捕入圣·贝拉监狱里,可见凡有国王的地方都有“文字狱”,全世界皆然。出狱后,他仍是关注现实,他画底层市民郊区农夫的贫困;他画多幅洗衣妇的沉重负担;他画三号车厢疲惫善良的农妇;他画形同乞讨的街头卖唱者;现在他画小酒馆的形形色色,打工的、玩“叶子戏”的……瞧,艺术爱好者、艺术家的朋友——加歇医生来了!他三笔两笔便勾勒出加歇的速写,怪不得德拉克洛阿称赞他素描的精确和概括,但他随画随扔,他更关心的是能否像伏尔泰说的:“想到什么说什么”,自由艺术世界的来临而不受限制、不关监狱,在他,自由更多时候是争取自由的斗争。他经常会和库尔贝、蒲鲁东这些朋友嘀嘀咕咕商议一些大事,年轻的纯艺术家们并不感兴趣。

加歇医生也不感兴趣。他看好杜米埃创作的独具个性的油画水彩画,狂野粗放,拒绝细腻,高度概括的造型和建筑似的颜料层层堆砌。加歇一向支持新派创作,离开巴黎后,他回家乡行医,和塞尚、凡高深交。凡高画过《加歇医生》肖像;想必他治疗

过凡高的疯病。

这一拨老顾客几年工夫纷飞云散,安德勒小酒店也就渐露出衰败的样子,尤其在库尔贝、杜米埃等人唱着同样的小酒馆里一传十、十传百地燃遍全国的《马赛曲》,冲向街垒巷战以后。接着,巴黎公社成立了!库尔贝在革命委员会里当“人民公仆”,领导和分管美术宣传;杜米埃是委员,都忙得不可开交。消息传到瑞赛学院和安德勒酒吧,艺术家们一片欢呼,好几个痛饮放倒在店堂。还不等完全清醒,忽然间,“大厦”倾塌,时代和个人的命运急转弯,库尔贝被复辟者关进圣·贝拉监狱,抓有据,放亦有因。出狱的他口袋里没有一个法郎,也失去了健康,以往受他接济的穷画家毕沙罗、莫奈、布丹不忘旧恩,轮流去照顾他,帮助他逃亡国外,听说他病在瑞士,莫奈和布丹赶去守候他的病榻前。稍觉好转,库尔贝便拾起画笔,画了最后的自画像,那饱经忧患的神情,诉说着人间的沧桑,只剩下无限和绝对。

莫奈和布丹在库尔贝临终前赶到瑞士,莫奈握住大师苍白无力渐趋僵硬的手,那曾经创作了《打石工》、《筛麦的女子》、《画室》等等体积感强烈、色块似大理石和玛瑙玉般斑斓而永久的伟构。钉上十字架却拒绝十字架。虔诚的布丹跪下了,似乎看到阿尔卑斯峰巅雪山的翠光,轻轻地呼唤:“美之精灵,请等一等……”

包括莫奈在内的新进画家们再不到安德勒小酒吧去,他们怕唱伤心酒吧之歌。他们转移到殉道者圣地的蒙马尔特,那里皮加勒广场附近,有一家新雅典咖啡馆,和圣心大教堂一样,漆成雪一般白,有人说:等同于真正的法兰西学院。印象派画家们在卡普辛纳大道举办展览之后,集中到新雅典咖啡馆,举杯庆祝展览会的成功。年长的毕沙罗宣布道:“我们被称为一群印象主义者,我们承认;就让我们将这一称号看做荣耀的标记吧!”这是新雅典咖啡馆入史的庄严的时刻。

因为毕沙罗而暂入印象派的塞尚,并不觉得荣耀,他厌世又性格孤僻,热闹了一阵之后,便离开巴黎,像《圣经》上浪子回家似的,回到他普罗旺斯埃克斯的故乡,去画那属于自己的山谷和树林。有一天,他画腻了,画不下去,望着远山沉思出神,忽而怀念起瑞赛学院那会儿,格莱巴苏尔老爹总绕到他画架背后,摇摇头,仿佛画不好是他——格莱巴苏尔老爹的责任似的。

“您好!您还活着吗?格莱巴苏尔?”

他问飘逝的浮云。